

哈贝马斯异化理论与转型期中国

○ 薛 平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规则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危机的产生。该理论是在马克思和韦伯的异化理论之后又一系统性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异化理论。这一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转型期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为这些问题提供相应的解决之道,而且,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揭露有助于认清资本主义的真实面孔,有利于对西方和平演变的抵制。但是,其宣扬的普世价值容易导致对霸权主义的纵容,而且其阶级矛盾虚无主义的理论前提会使人们忽视阶级矛盾在现实中的存在。

[关键词]哈贝马斯;异化理论;交往行为理论;转型期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乃至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其一生致力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及对其解决之道进行研究,并以此建立了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在其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通过其依靠理性建立的规则世界和以人性和人的交往行为为基础的“生活世界(life - world)”的划分,指出规则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异化,并力求通过建立一套交往行为的普适性规则,以克服这种异化,使人类社会实现对“生活世界”的回归。^[1]哈贝马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交往异化理论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当前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哈贝马斯的异化理论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其对资本主义存在的异化危机的论述不仅能够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认识,而且对转型期的中国有着很现实的警醒作用。但是,哈贝马斯对异化危

作者简介:薛平(1974—),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

机的解决之道中所包含的阶级调和以及普世主义的思想,却可能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哈贝马斯的异化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转型期中国应当选择的道路。

一、哈贝马斯异化理论对现代中国的学术意义

哈贝马斯异化理论中规则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其根本原因是现代社会对理性的追逐,从而使需要沟通取得共识的公共领域转型为冰冷的国家机关和市场体系为代表的规则所主导的场所,作为个体人的利益被忽视,最终形成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其正在推行的现代化进程,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理性的追求,并且正在重复哈贝马斯所描述的理性导致的规则世界对“生活世界”入侵的过程。现代中国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可以从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理论中得到解释,以下分别从经济、社会和体制转型三方面导致的问题对其意义进行具体分析。

(一) 经济转型中出现的问题

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实际上是追求市场化和经济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化过程,因此,以经济利益而不是人们的幸福成为判断成败的最高标准,从而产生哈贝马斯所谓的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导向的规则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的产生。诸如盲目的“GDP至上主义”,它是以理性的科学数字作为判断政绩标准的必然结果,由于经济发展需要所形成的经济利益至上的理性,必然导致对最能体现经济发展的GDP数值的追求。“GDP至上主义”保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目的实现的同时,必然伴随着理性所忽视的传统价值的流失,良好的自然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受到冲击甚至破坏,从根本上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其次,逐利的交往行为滋生了拜金主义,经济转型产生的经济利益至上的理性标准致使人的交往行为不是以取得协调共识为目的,而是以是否能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作为衡量标准,从而直接造成传统道德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为目的的感情至上的交往标准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进而出现符合经济理性标准的拜金主义,直接导致了现代中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各种唯利是图的不和谐因素的出现。^[3]再者就是逐渐显现的生态危机,国家在转型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性追求中,追逐经济利益的理性主体如企业等必然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滥垦滥伐、过量排污等明显都同其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追求相一致,因此传统道德要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价值被抛之脑后,从而造成现在中国不得不面临的土壤沙漠化、天气灾难化、空气雾霾化等各种生态危机的恶果。^[4]

(二) 社会转型过程中凸显的问题

在经济转型的同时,中国也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由于人们对哈贝马斯所谓的“交往行为”的忽视,从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和协调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诸如,信任危机、对西方社会的盲目崇拜

等现象。目前来看,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信任危机,其最极端的例子是见义勇为的行为成为他人敲诈的对象,导致现在帮助他人都必须冒着被告上法庭的风险。信任危机产生的根源可以依据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得到解释,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合理的“交往行为”被不合理的“戏剧行为”取代所造成的。为了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目的,很多人将传统道德抛之脑后,以“戏剧行为”向他人传达错误的信息,通过诱人上当从而使自己获利。^[5]最终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猜忌,信任危机日益深重。与我国相比,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先一步达成现代化理性目标,其优越的生活条件必然会被某些追逐现代理性的中国人所追捧,甚至到了盲目崇拜的程度。究其原因在于很多人将社会发达程度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对发达社会的各种信息进行选择性接收时,所获信息严重失真,隐性遮蔽了发达社会的缺点和内在矛盾。如此对西方社会盲目的崇拜,其结果会使中国固有的优良传统丢失,逐渐丧失中国自身具有的特色和优势。

(三)体制转型过程中隐现的问题

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相配套的是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的转型。按照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理论,这一转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为了达成现代化的理性目的而使相应的国家机关和市场管理体系等完全为现代化的理性目标服务,因为缺少相应的合理的“交往行为”的沟通和协调,从而不能取得相应的共识而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为了完成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的构建,国家体制的改革往往仅从最大化市场利益的理性角度出发,在国家管理机关和具体操作程序上以提高经济效益作为最高目标,可能忽视交往中普通民众的利益,如地方官僚主义造成的腐败问题,还有为了保证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的利益出现的野蛮拆迁屡见报端。“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的这种纯粹追求经济效益的理性行为必然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6]其中之一就是对社会主义道路存有疑虑。中国在发达程度上同西方国家的差距,这一点不容回避。很多人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产生错误的认知,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理性要求,因此要求在体制改革中不惜代价全力推进私有化,以最大程度达成效益最大化的理性要求。^[7]这些人根本不与普通民众进行任何哈贝马斯所谓的“交往行为”,因此意识不到公有制经济事实上代表着普通民众的利益,而以单纯的经济效益为体制改革的目标,从而对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种种疑虑。

二、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和韦伯异化理论的发展

“异化(Alienation, Entfremdung)指某物通过自己的活动而与某种曾属于它的他物分离,以致于这个他物成为自足的并于本来拥有他的某物相对立的一种状态。”^[8]异化不只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在政治哲学中也有着强烈的隐含意义。从异化的角度对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的危机进行分析,是现代哲学对社会发

展带来的各种现实问题进行解释的主要路径之一。哈贝马斯的规则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入侵而导致的交往异化理论,是继马克思人的异化理论和韦伯理性异化理论之后又一产生很大影响的系统异化理论。

(一) 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理论

哈贝马斯异化理论产生的基础是其交往行为理论。对哈贝马斯来说,交往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是一种独特的和极为重要的社会互动类型。这种互动试图通过论辩过程来达到相互理解。在这种交往行为中,参与者在对所处情形具有一个共同理解的基础上协调他们各自的计划,并要求所有相关者都认可这种协调。交往行为追求共通一致而非私人优势;参与者并不单单以有利于自己利益和计划的方式来影响他人行为。交往行为与“策略行为(strategic action)”相对立,在后者之中,个体参与者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操纵其对手。策略主义是工具主义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其特点是个体行事者们力求通过一切有效手段而达到各自的目的。交往行为则是一种对话,以互动互惠为特点。在这种行为中有隐含着的规定有效性的规范,每一方的行为都出自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非强迫义务。“交往行为的概念预设语言为达到某种理解的中介。在这一理解的过程中,通过与一个世界相关联,参与者互动互惠地提出可被接受或争议的有效性要求。”^[9]

哈贝马斯首先将世界分为主观、客观和社会世界三种类型。哈贝马斯认为,整个人类生活的世界共有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以及社会世界三种类型,而社会世界还可以分为规则世界和生活世界。规则世界是以制度化、组织化以及科层制化为特征,包括国家机关和社会市场体系的世界。哈贝马斯把要有学术说服力地把握社会规范体系称之为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包括“背景性信念这一广博而复杂的情况在内。属于背景性信念的,不仅有个人的知识,而且还有文化遗产。”^[10]生活世界则对应着可以通过语言进行沟通,寻求彼此间的协调合作的尚未纳入目的性世界的“原始世界”,包括需要沟通取得共识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以及维持私人利益的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两大部分。交往行为理论又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借助于工具理性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性行为、以行为者共同价值取向为目标的规范性行为、个体在观众或对象之前表演的戏剧性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互相沟通和协调的交往行为。哈贝马斯认为,前三种行为分别单独对应着客观、社会 and 主观世界类型,目的性行为对人的主观性产生了压制,而规范性行为和戏剧性行为则使人成为社会的某种符号,因此都是不合理的行为。而第四种行为则实现了主观、客观和社会世界的综合和扬弃,因此是合理性的行为。^[11]

哈贝马斯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对目的合理性的追求,以前三种行为为主的规则世界在公共领域取得压倒性优势,造成了规则世界对“生活世界”公共领域的入侵,于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间的各种矛盾纷纷出现,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要解决这一规则世界对“生活世界”入侵导致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危机,有必要设定一整套人们公认的理想交往行为准则,依靠理性的交往行为,在寻求共识的过程中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领域重新由互相沟通和协调主导的交往行为主导,从而重回理想中的“生活世界”。^[12]

(二)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和韦伯异化理论的发展

1.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和韦伯异化理论的批判

在哈贝马斯看来,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其异化理论的指向都是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为出发点。马克思人的异化理论中对人进行奴役的是人自身改造过的物质和精神产品,而韦伯目的合理性形成的理性牢笼同样指的是人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过程中形成的理性。但是,作为生活在客观世界的人类,至少从目前的发展历史来看,由于客观世界的无限导致对其改造的无限,人类对改造客观世界的理性追求根本没有尽头。只要有这种理性追求的存在,马克思和韦伯所发现的异化现象就会一直存在。因此,“马克思和韦伯所论述的异化现象根本不可能从其产生的根源,即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中找到出路。”^[13]虽然在马克思所设计的共产主义蓝图中,由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类最终可以摆脱由于追求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效率而需要的社会分工的束缚,从而摆脱其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对自身进行奴役的现象。然而,就目前人类发展的社会阶段而言,还看不到能够取代社会分工这一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符合改造客观世界理性的替代方式,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人类摆脱社会分工的束缚,从而不再受自身改造物质世界的产品所羁绊依然只能停留在设想的阶段。而对于韦伯来说,随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从而对客观世界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以来,效率最大化的理性就已经彻底占据了社会的主流意识。由于人类对改造客观世界的欲望的无止境,其对效率最大化的理性追求同样无止境。因此,由人类追逐利益的欲望导致的理性牢笼只会随着其改造客观物质世界力量的增强而变得越来越牢固。任何试图打破这种理性牢笼的行为,因为其直接同人类自身所创设并奉行的冰冷的科学和理性相背离,从而必然面临失败的结果。因此,在科学和理性昌明的现代社会,人类改造客观物质世界所需要的理性对人自身的控制是必然的,解决由此引发的理性异化现象的任何方案都必然是徒劳和绝望的。

据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论马克思还是韦伯对相应的异化理论论述得多么精辟,由于其将人的发展限制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中考虑,因此根本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其最终的逻辑结果要么像马克思那样直接打碎旧有的人为了改造客观世界而形成的固定分工关系,将希望寄托在同现代世界完全不同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要么像韦伯那样在悲观绝望中认为人类改造客观世界而形成的理性牢笼过于强大,根本不可能将其打碎从而找到解决理性异化的任何办法。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本质上是交往行为——理性自身的反思也被安置其中,因此它是一种有联系的、并有约束力的理性。”^[14]在他眼中,这些以人与客观世界关系为出发点的异化理论忽略了人的精神活动、行为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生活世界”同人与人之间联系的语言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因此寻

找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危机的根源不应仅仅局限于人和客观世界,而应在上述因素中寻求其出现异化的真正原因,并找到相应的解决之道。^[15]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哈贝马斯通过将世界分为主观、客观和社会三种类型,并将社会类型进一步分成规则世界和“生活世界”。并认为人的四种行为中,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对理性的追逐,导致违反人的本性的前三种行为,即目的性、规范性和戏剧性行为主导的规则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入侵,从而导致异化危机的产生,必须依靠符合人的本性的第四种行为,即交往行为的努力,才能解决异化危机,重回“生活世界”的理想社会。^[16]

2.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和韦伯的异化理论发展的理论意义

哈贝马斯继承了马克思和韦伯关于现代社会存在异化危机的思想。哈贝马斯虽然认为马克思和韦伯的异化理论因为仅仅着眼于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从而找不到任何解决现代社会异化危机的方法。但其本身并不否认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理论和韦伯的理性异化理论。其交往异化理论的实质,是人类为改造物质世界而创造的理性的规则世界对传统的“生活世界”的入侵,从而导致人的本性异化的危机。因此,其交往异化理论中人类为改造物质世界创造规则世界,本质上同马克思人的异化理论中人类自身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韦伯理性异化理论中为达到效率最大化的科学和理性一脉相承,而其对“生活世界”的侵害,同样是马克思所表述的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对人自身的奴役以及韦伯所表述的理性对人的本性的压制在交往理论中的不同表达方式。甚至其所声称的同马克思和韦伯的解决路径完全不同的对异化危机的处理方式,也同马克思的解决办法有着非常密切联系。马克思认为,解决人的异化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摆脱社会分工的束缚,建立一个将人的全面发展置于最高目的的共产主义社会,从而使人摆脱其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奴役。^[17]哈贝马斯则认为,只有通过符合人的本性的交往行为,在各方达成充分共识的前提下才能解决规则世界对“生活世界”入侵所造成的异化危机。实际上,以交往各方达成充分共识为前提,就是要求现代社会不再以社会分工追求的效率最大化为追求目标,而是代之以符合人类全面发展需要亦即人的本性的人类共识作为最高标准,因此其解决方法在此方面同马克思并不存在根本的区别。正是由于哈贝马斯继承了马克思和韦伯异化理论的合理内核,因此其能在很大程度上对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进行符合逻辑的合理解释。

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理论是为马克思和韦伯所描述的异化现象寻找新的解决路径的重要尝试。对于现代社会而言,马克思提供的共产主义理想图景并不具备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而韦伯则干脆对解决现代社会的异化危机持悲观绝望的态度。然而,各种异化现象造成的危机是人类社会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对其如何解决始终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哈贝马斯针对这一情况,适时提出了通过合理的交往行为,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解决现代社会异化危机的方法。虽然这种解决方法依然存在如何保证各方形成真正的共识这一根本难题,但在现

代社会异化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其统治的稳定,代表追求效率最大化这一理性规则的资产阶级确实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同普通民众进行协商,从而对相应的异化危机起到暂时的缓和作用。

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理论依然存在同韦伯理性异化理论类似的局限性。哈贝马斯声称其通过直接从人的交往这种人与人的互相关系而不是人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出发,找到了解决现代社会异化危机的道路。但事实上,决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纽带是其互相之间存在的各种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的产生则同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直接相关。由此看来,人与人的交往仍然必须建立在人对客观世界改造的基础上,因此哈贝马斯提出的解决异化危机的前提,即通过正常的交往形成人类的共识,首先必然是经济利益上的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事实上意味受效率最大化原则支配的理性世界的代表资产阶级同受人类本性支配的普通民众之间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妥协。在马克思眼中,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根本就是追求效率最大化带来的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而韦伯也认为现代社会不可能否定自身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理性,因此代表效率最大化这一理性的资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同代表人的本性的普通民众达成真正的共识。由于无法解决韦伯理论中代表效率最大化的理性对人的本性的压制问题,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异化危机提出的解决方法在现实中必然陷入韦伯所谓的理性牢笼困境而找不到任何出路。

三、哈贝马斯的异化理论对转型期中国的借鉴意义

正是因为转型期中国同样存在哈贝马斯交往异化理论中所阐述的种种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哈贝马斯的这一理论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在充分发挥其正面作用的同时遏制其负面作用的产生。

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理论不仅给转型期中国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相应的解释,其提出的现代社会异化危机的解决理论同样值得借鉴。哈贝马斯认为,只有通过建立一套人们公认的交往准则,从而使人们之间恢复正常的“交往行为”,使社会的公共领域在沟通达成共识的过程中,从纯粹规则理性主导的世界回归“生活世界”,异化危机自然解除,规则世界对“自然世界”的侵犯也就不复存在。因此,对于转型期中国而言,建立某种公认的交往准则非常重要。一方面,在公共事务管理领域应当建立国家机关和普通民众的法定沟通渠道,以使国家政策能够充分反映民众利益并与民众取得共识;^[18]另一方面,在公共交往领域,应当鼓励各种民众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如举行各种普通民众参与的社区活动,组建以普通民众为主的各种以交流为目的的民间组织等,并以法律的形式对故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唯利是图的行为以及对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进行严惩。^[19]通过这些措施的施行,在社会中重建人与人之间、普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机制,从而缓解上述“GDP至上主义”“拜金主义”“生态危机”以及“信任危机”等问题。

哈贝马斯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社会危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而事实上这种规则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异化,其实质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理性规则对代表普通民众利益的“生活世界”进行的剥削和压迫,可以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隐藏在所谓理性规则背后的资产阶级贪婪的嘴脸,从而改变部分人因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缺乏了解而产生的盲目崇拜西方的不正确态度,自觉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我国完全陷入哈贝马斯所谓的现代社会的交往异化危机。

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理论的根本解决之道,是制定某种普适性的交往规则,从而保证“交往行为”的有效性,通过沟通和协调,从而取得全社会的共识,使公共领域从规则世界的主导下重回通过沟通取得共识的“生活世界”之中。这一解决之道的前提,是其提出的制定整个社会全体遵守的交往规则这一普世理论。但事实上,因为制定规则的权力掌握在垄断资产阶级的手中,哈贝马斯这一普世理论极容易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实行霸权主义的理论依据。^[20]而事实上,在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时候,哈贝马斯即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兽性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一文,根据自己的普世理论的逻辑,论述这场霸权主义国家发动的战争的正义性,公然为霸权主义国家干涉他国张目。而事实上,在其认为当时的南联盟因为严重践踏人权而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军事惩罚时,以霸权主义国家为代表的国家却并没有履行其保护科索沃人民人权的义务,而是为其带来了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因此,哈贝马斯在其异化理论中宣扬的普世理论很容易误导某些中国民众,对霸权主义国家打着普世主义的幌子对其他国家的干涉采取纵容态度,甚至想方设法为这些国家的霸权主义行径进行辩解,从而误导社会舆论,产生相当不好的社会影响。

哈贝马斯在其交往异化理论中宣扬的回归“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理论基础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已经缓和甚至是不存在,从而认为可以通过全社会共同制定规则的方式,通过协商和沟通来解决作为资产阶级利益体现的规则世界与普通民众利益体现的“生活世界”之间存在的异化危机。其看不到这种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资产阶级掌握规则制定权力的前提下,制定某种取得全社会共识的规则必然会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而使这种规则没有出现的任何可能性。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所以真正的解决之道只能是推翻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规则世界,在社会主义制度代表全体民众利益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建立这种获得全体民众认可的普适性规则的理想。因此,哈贝马斯宣扬的回归“生活世界”的理论前提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虚无论,如果毫无条件地接受哈贝马斯的这一理论,必然导致对阶级矛盾的忽视,从而使人们丧失对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性的信心。

哈贝马斯的规则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异化理论,是继马克思的人的异化理论和韦伯的理性异化理论之后对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异化危机又一进行系统性阐述的理论。这一异化理论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

面,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哈贝马斯所描述的现代社会规则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异化现象日益严重,如生态危机、拜金主义、信任危机等愈演愈烈,哈贝马斯的异化理论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选择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之争在中国仍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哈贝马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危机的深刻揭露,有利于中国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注释:

- [1] 陈树林:《交往行为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北方论丛》2002年第1期,第46-51页。
- [2] 陈和芳、蒋文玉:《“GDP至上主义”影响社会守法水平的经济学解析》,《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20-24页。
- [3] 史少博:《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拜金主义》,《兰州学刊》2010年第11期,第8-11页。
- [4] 王四达:《“天人合一”的误读与中国生态危机的出路》,《学术研究》2009年第5期,第15-19页。
- [5] 高兆明:《信任危机的现代性解释》,《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第5-15页。
- [6] 刘国旗、谭小攀:《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与实现中国梦的内在逻辑》,《江汉论坛》2014年第6期,第53-56页。
- [7] 李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不适用了吗——从现实社会结构进化理论与实践看与此相反的结论》,《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25-28页。
- [8] 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0页。
- [9]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1984年,第99页,转引自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0页。
- [10] 德特勒夫·霍斯特:《哈贝马斯》,鲁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 [11] 张晓溪:《公共领域的异化:哈贝马斯视域中的“公共性”危机》,《学术交流》2006年第12期,第6-10页。
- [12] 陈志刚:《交往理性思想:批判与乌托邦》,《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1期,第16-22页。
- [13] 唐爱军:《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韦伯与马克思》,《理论与现代化》2011年第5期,第17页。
- [14] 尤尔根·哈贝马斯等:《对于缺失的意识——一场与哈贝马斯的讨论》,郁喆隽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91页。
- [15] 胡鸣铎、牟永福:《从马克思、韦伯到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异化的批判与反思》,《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65-69页。
- [16] 沈一兵、张登国:《构建和谐社会——对合理化与异化的扬弃》,《江淮论坛》2007年第3期,第13-17页。
- [17] 阳桂红、刘大欣:《关于马克思异化思想和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比较》,《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23-126页。
- [18] 郝玲玲:《政治沟通与公民参与:转型期中国政府公信力提升的基本途径》,《理论探讨》2012年第5期,第153-156页。
- [19] 李绍伟、池忠军:《有效性社会道德规范建构的普遍化考量——基于哈贝马斯交往伦理学之普遍化原则》,《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6期,第79-82页。
- [20] 苏平富:《交往行为、话语伦理与民族国家主权的终结——哈贝马斯主权终结的反思》,《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23-28页。

[责任编辑:钟 和]